



彭真传

第四卷

彭真传

第四卷

(1979—1997)

《彭真传》编写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彭真传/《彭真传》编写组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73 - 3643 - 6

I. ①彭… II. ①彭… III. ①彭真 (1902 ~ 1997) - 传记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0601 号

彭真传

编 者/《彭真传》编写组

责任编辑/杨茂荣 孙 翊

责任印制/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010 - 66513569 63097018 66183303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华艺排版公司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 × 960mm 16 开 105.75 印张 132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ISBN 978 - 7 - 5073 - 3643 - 6 定价: 180.00 元 (全 4 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卷目录

四十四、复出	(1283)
四十五、三个月出台七部法律（上）	(1300)
四十六、三个月出台七部法律（下）	(1331)
四十七、“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1367)
四十八、整顿治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1403)
四十九、主持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上）	(1431)
五十、主持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下）	(1457)
五十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化	(1488)
五十二、实行村民自治推进基层直接民主	(1512)
五十三、在改革中推进民事立法	(1537)
五十四、在“大转变”中推进人大工作（上）	(1568)
五十五、在“大转变”中推进人大工作（下）	(1599)
五十六、退出领导岗位之后	(1627)
后 记	(1668)

四十四、复 出

彭真的复出，是人心所向。

不少同志记述了一九七八年底彭真夫妇从陕西回北京的情景：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几百人怀着对彭真的深厚感情，自发地赶到机场迎接。吕正操、林铁、程子华、郑天翔、王汉斌、甘英等都去了，整个候机大厅挤得满满的。由于航班延误，从下午两点多等到五点，天渐黑，飞机才抵达。当时，候机大厅通往停机坪的大门已被锁上。飞机降落时，吕正操的弟弟打开了候机大厅大门，黄甘英带领大家冲到了停机坪。“大家蜂拥到了飞机舷梯旁，深情地望着机舱门打开”。彭真夫妇面露慈祥笑容、衣冠整齐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像出访回国一样气派”，“一点也不像是流放回来的”。一位机场服务员喊出了压抑太久的声音：“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面对这个特殊的重逢场景，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大家一起回到候机大厅，程子华大声说道：“彭真同志，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发来的，不代表谁，跟谁都没有关系。”彭真也很激动，一一与大家握手，眼圈也红了。离开机场时，中组部派去的同志请彭真夫妇坐他们带来的苏制吉姆车。吉姆车门低，彭真年纪大，个子又高，上车很费劲。吕正操看不下去，请彭真坐自己的“大红旗”，彭真说：

“不用，组织上给我派什么车，我就坐什么车。”挤上吉姆车就走了。^①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晚会上公开露面。

刚刚回到北京的彭真，当时还未获得平反，暂住前门饭店。然而，老战友、老部下、亲朋好友都来了，“排着队等着看望”，“连续半个月”，人来人往，“络绎不绝”^②。二月十四日，陈云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也留下了看望彭真的回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去处，无法再同他交往，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和为他的安危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在他复出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看望他，表达真挚的慰问。他仍然一如既往，大度乐观，说他过得很好，没有受什么苦，只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③

经过十多年的磨难，彭真已显苍老，但他依旧精神矍铄、乐观开朗、谈锋甚健，只是避而不谈自己和家庭的遭遇。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到处是血和泪的控诉。许多受到迫害和冤屈的干部心中不平，纷纷倾诉自己的苦难遭遇和怨愤心情，这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彭真个人所受的磨难比这些干部要深重得多，他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和自己的遭遇所表现出的平静与豁达，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① 《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访张文奇》、《京剧改革中的斗争——访李莉》，见《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83、306页。

② 《京剧改革中的斗争——访李莉》，见《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06页。

③ 阿沛·阿旺晋美：《良师挚友情谊永存》，见《缅怀彭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72页。



1979年1月，在首都春节联欢会上，先后担任北京市市长的叶剑英、聂荣臻、彭真欣喜重逢。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多次遭受红卫兵的揪斗、殴打。彭真回京后，当年批斗过他的一些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向他道歉，请他原谅。彭真却从不怪罪这些年轻人。一九七九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一次小型会议上，彭真谈起那些揪斗过自己的年轻人，说道：“小孩子懂什么？他们当初揪我斗我，把我弄到东郊体育场，十二月的天气，我连袜子都没穿上。我出来后，他们来看我，给我赔不是，我说责任不在他们。我这个人没有 kiss（亲吻）的习惯，但我还是一个一个地亲了他们。”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彭真在中央党校作《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间突然停电，不一会儿又来电了。这时，有个学员递了一个条子，问道：“彭真同志，你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遭遇？”彭真念了条子，回答：“那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停了一阵，现在电灯不是又亮了吗？”听了这样的回答，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彭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工作后发现，机关内一些同志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或多或少的错误，思想上有包袱，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同志间的关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刚从南方调研回来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圆厅接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讲了机关干部作风问题。他说：“过去的问题，要区别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办坏事。只要属于好人犯错误，不管是谁，错误多大，承认了，改了，就好。受了林彪、‘四人帮’毒害的，消消毒，把毒害清除掉就是了。身上脏，洗洗澡，就干净了。”他要求同志们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克服派性，加强团结。他说：现在就是要把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向前看，

团结起来搞四化。”^① 彭真的讲话在机关产生了强烈反响，不仅使那些有思想负担的同志放下了包袱，对所有的同志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彭真从不谈自己的遭遇，不抱怨个人的冤屈，却十分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彭真曾与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一起工作多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刘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彭真对刘仁的去世十分痛心，回京后，即邀刘仁的夫人甘英叙谈。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彭真参加了刘仁的追悼会，并在七月二十二日写下了“深切怀念刘仁同志”八个大字。一九八二年，彭真在《北京日报》创刊三十周年致范瑾的信中，高度评价刘仁实事求是、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精神。一九八四年，彭真提出：像刘仁这样的同志是应当为他立传的。^② 随后，彭真亲自向甘英交代编写《刘仁传》的事宜。一九八五年十月，彭真为即将编写的《刘仁传》题词：“怀念忠心耿耿、严肃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对革命建设事业特别是首都的建设有卓越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刘仁同志。”

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原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彭真回京后不久，就在家中会见了她和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彭真对她们说：“你们两个命运相同。我担心的是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彭真还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五十一岁就走

^① 彭真：《人大常委会机关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55页。

^② 郑天翔致甘英的信，见《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74页。

了。”说这些话时，彭真的眼圈红了。李莉担心彭真太难过，赶快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说了，让它们都过去吧。”彭真大声说：“过去就过去了嘛！”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①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部纪录电影片《农业学大寨》，是反映北京郊区农业学大寨情况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说这部纪录片是与大寨唱对台戏，是对毛主席树立的典型不服。由此，北京市的农业劳动模范多被打成“彭真的爪牙”、“黑线人物”，受尽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死。彭真回京后，几乎走遍了北京郊区，去看望农业劳动模范。有一次，彭真去房山考察，提出要去南韩继村看望劳动模范徐庆文的老伴（徐庆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房山县委书记说，徐庆文死后，他的老伴受刺激太大，精神有些错乱，怕见到彭真后激动，再犯病。他劝彭真不要去了。彭真坚持要去，经劝慰、商量，才决定只到村口，不去徐庆文家。车到南韩继村口，彭真下车看了村子的模样，又把村党支部书记找来，深情地嘱咐他，要学习和继承徐庆文的好作风、好传统，把村里的工作做好，还要照顾好徐庆文的家属。

从一九四三年起就跟随彭真做警卫工作的李志玉，“文化大革命”中与夫人袁力荣都遭受了迫害。彭真始终挂念着他们。彭真回京后，袁力荣带着孩子来看望他。分别十多年，当年被彭真叫做“小孩”的袁力荣，已是疾病缠身，白发斑斑。彭真紧紧拉着她的手，又抚摸着孩子们，仔细询问他们的境况，得知李志玉曾被关押，胃病加重，后来做了胃切除手术；袁力荣也被开除党籍，一家人艰难度日。彭真的心情十分沉重，不断地说：“你们受苦了，都是我连累了你们一家。”彭真的女儿傅彦把袁

^① 《京剧改革中的斗争——访李莉》，见《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07页。

力荣拉到一边，塞给她五百元钱，一定要她收下，说：“爸爸说了，别人家的孩子管不过来，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一定要管。”^①此后，彭真一直把李志玉一家当做自己的亲人，悉心照顾他们。

彭真还亲自去看望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志如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等，并会见了一些遭受迫害的知名人士或者他们的家属如马连良的夫人陈慧珪、荀慧生的夫人张伟君、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给予安慰和鼓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但当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少数坚持极“左”错误的人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发生了动摇。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就是他蒙难的开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有一肚子怨气。出人意料的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彭真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每谈及毛泽东，必先谈其功绩。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泽东

^① 《五十年同甘共苦——访袁力荣》，见《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51页。

同志永远是我们的主席。”他还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后来我被关在监狱，反复想，我做得不错呀。我想，共产党、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再来找我的，这些事历史上都有，错了的又给平反嘛！”^①

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回忆，一九七九年彭真住在北京医院接受体检，同住北京医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谈话中，彭真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对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惋惜不止。”但“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诋毁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他旗帜鲜明地说，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②

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一九八〇年初，有一天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彭真同志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个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误党误国，还可能把被崇拜的对象推向反面。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

^① 李尚志：《晚年的彭真》，见《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10、312页。

^② 李立功：《彭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见《缅怀彭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02页。

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圣贤啊！圣贤也会犯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真还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①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彭真回京后第一次出席中央的会议。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但毕竟已是万木复苏的季节。彭真与许多老同志久别重逢，把手话旧，百感交集。当时，彭真还没有进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只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与他被打倒前所担任的一系列重要职务相比，显然是低多了。许多已经恢复职务的老同志都关心地问他是否已经落实政策。彭真回答：“共产党员只要有工作做，就是落实。”

^① 李尚志：《晚年的彭真》，见《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12页。

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彭真会讲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的冤屈实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却明确表示，这时候必须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邓小平三月三十日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彭真参加东北组讨论，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透彻地解决了当前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关键问题”。彭真说：

“小平同志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四个坚持？因为有人对这四个根本原则发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实际上，没有这四个坚持，就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一切。

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

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

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



彭真与邓小平在一起

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末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①

杨景宇回忆：有一天，我向他汇报有些同志对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些议论。我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个人讲，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没气？但是，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七大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彭真复出后，中央决定由他主持法制建设工作。这样决定，首先出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急需。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① 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见《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64、365页。

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当时，彭真无疑是能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彭真长期具体主持立法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中央的决定也与他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不谋而合。经过十年动乱，彭真更深地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任务。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从被投进秦城监狱到流放商洛山区，十多年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的法制遭到破坏，陷入了“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次发生，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刻不容缓、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京举行。乌兰夫副委员长向会议作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说明。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由八十人组成的法制委员会名单，彭真为主任，胡乔木、谭政、王首道、史良、安子文、杨秀峰、高克林、武新宇、陶希晋、沙千里为副主任，委员六十九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6页。